

展开意义深远的长期性经济改革并非易事。改革的成效通常在数年之后才显露出来，而其带来的痛楚则是马上可感受到的。在我们新的“前沿”系列里，政策制定者描述了在推进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生产效率以及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的改革中所面临的挑战。



照片：PETER ANDREWS/REUTERS/NEWS.COM

机会之窗

莱谢克·巴塞罗维奇解释为什么在当公民愿意接受变化的时候迅速采取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波兰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设计师，莱谢克·巴塞罗维奇 (Leszek Balcerowicz)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研究改革该国苏联风格体制的方法。之后，他成为团结工会运动的顾问。在 1989 年至 1990 年期间，巴塞罗维奇担任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以及副总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欧的首个非共产主义政府。在 1997 年至 2000 年期间，巴塞罗维奇又再次担任上述职务，并于 2001 年至 2007 年期间出任央行行长。他在华沙中央规划和统计学院（现华沙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仍在该学院任教。

在本次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 (F&D) 的采访过程中，巴塞罗维奇 (LB) 回顾了他第一次出任财政部部长时的工作强度，并讲述了他是如

何设法通过充分利用“非常政治”的狭窄窗口来克服所面临的障碍。

F&D: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您组建了一支经济学家团队来研究改革现有社会主义体制的途径。您说过这项工作就像一个业余爱好，因为改革的前景可能很渺茫。1981 年 12 月国家实施了戒严法。之后发生了什么？

LB: 在实施了戒严法之后，就没有开展任何一项重大改革的希望了……但是，我们仍然持续开展工作，不过这次我们突破了所有限制条件。所以，我们研究了私有化、自由化和财政改革……当然，那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发挥作用。

F&D: 之后，团结工会和共产主义政府之间开展了所谓的圆桌谈判，再接下来就进行了选举，并产生了由团结工会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主持的新政府。您曾经讲过您会接受这项工作，但必须要满足某些特定条件。那么是哪些条件呢？

LB: 首先，经济改革应该是大规模、迅速且彻底的。其次，我要带着我的团队进入政府。再次，我以副总理身份担任内阁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来协调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作。与此同时，我接受财政部部长这一职位。此外，我要在“谁掌管经济部门”方面具有发言权。

F&D: 您当时对经济形势做出了怎样的评估？

LB: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产出不断下降。我们当时存在恶性通货膨胀，背负着沉重的外债。而且，在我接受这个职务之后，我才发现情况其实更加糟糕，因为我发现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隐藏的国内债务。

F&D: 您是怎样进行战略抉择的呢？

LB: 首先，我们清楚……一旦一个国家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就必须迅速减缓印钞速度。其次，通过研究之前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我们了解到，在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中，最开始实施的变革必须非常迅速且规模庞大，（我们也知道）变革不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各项重大变革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基本在同一时间启动。

F&D: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

LB: 1989年波兰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在此之后,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时期, 我称之为“非常政治”, 这是一个机会窗口。如果您愿意, 人们比常规状态下更加愿意接受激进的变革。我们在波兰广泛领域内所采取的迅速行动就是对这一历史所馈赠礼物的最好利用。经济的超快速稳定和大规模自由化包括取消大部分国内垄断……

F&D: 当您刚刚就职时, 您遇到的最迫切的挑战是什么?

LB: 主要问题是整治恶性通货膨胀。从技术层面上讲, 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 我们必须减慢印钞速度, 所以主要的挑战是财政方面的。与此同时, 我们引入了央行的独立性原则。

F&D: 那货币方面情况如何? 当时货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 而且当时的美元黑市还相当活跃。

LB: 我们启动的最重大的改革之一是统一汇率并使货币实现自由兑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革命, 因为人们就可以合法地进口产品了。因此, 增强了供应方面的竞争。

F&D: 您当时是如何决策汇率制度的?

LB: 有一段时间我们选择了固定汇率, 但是非常难以抉择。当时IMF持这样一种观点, 即波兰需要一个名义锚来终止恶性通货膨胀, 这一点我那时是接受的。当然, 要想确定波兰兹罗提应该稳定在怎样的一个汇率水平上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F&D: 您当时刚刚步入政坛。那么您是怎样实现过渡的呢?

LB: 我不是为了从政而从政。当时我是被请去做一项工作的, 而这项工作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我们不需要开展大量的公共传播和劝导, 因为我们团结工会运动占据着议会多数席位, 而且无需进行大量的解释而延缓变革, 这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因此, 从政治角度上看, 这是非常轻松的。

F&D: 当时有100万人丢掉了工作。您对这一政治成本是否感到担心呢?

LB: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广为传播, 因为, 首先, 人们将社会成本与改革联系起来, 但其实延迟改革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其次, 关于就业, 你需要了解当时在社会主义企业之中存在着大量隐性失业, 而且, 一些隐性失业之后被公开了。再者, 最初的有关失业津贴的法律过于宽松。

F&D: 波兰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LB: 在过去的300年间, 波兰在经济上一直落后于西欧,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差距在不断扩大。直到1989年, 我们才借助市场改革, 开始奋起直追。1989年, 我们的人均收入为德国的大约30%, 后来增长到近60%。这是过去三个世纪中波兰首次与西欧趋近。

F&D: 当时您是否担心选民会将经济阵痛归因于改革?

LB: 在刚开始的两年中,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抗议, 政治抗议也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如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的那样, 总有一些政治家, 他们试图通过对其称之为严厉或不人道的经济改革加以批评来捞取政治资本。

F&D: 是否存在一些您希望能够进行改革但当时未被触及的领域?

LB: 如果当时我能够与更多的人并肩作战, 我们可能会对遗留下来的社会体制、养老金改革和医疗改革进行更多的变革。

F&D: 您的这种经验对当前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否具有参考性?

LB: 目前有很多被国有部门主导的准社会主义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与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时的情况具有可比性。

F&D: 当回顾这一时期的时候, 您对您本人所发挥的作用有哪些反思?

LB: 即便在1989年年初, 我也没有奢望波兰会变得自由, 我可以在国家转型中扮演某种角色。当然, 这并不容易, 但是如果发生了某些超出你设想的状况, 你也不能抱怨。**FD**